



A M E R I C A N E L E C T O R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美国选民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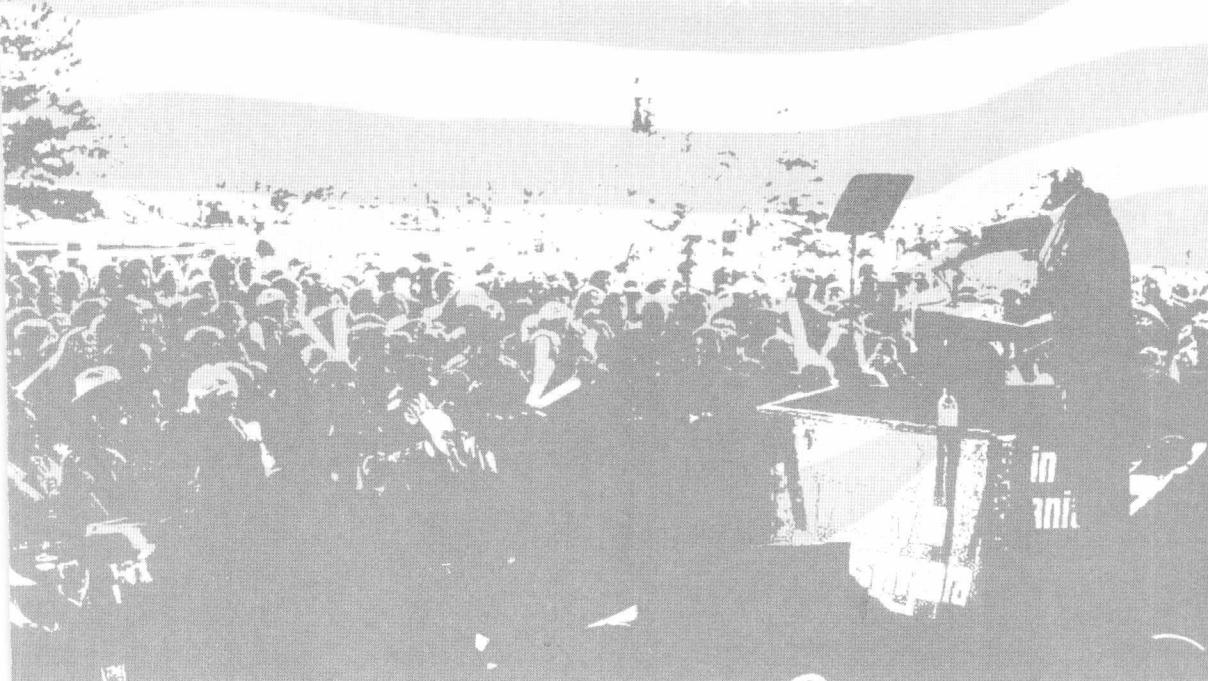
聚焦三个长期性主题

AMERICAN ELECTORAL
PSYCHOLOGY

A FOCUS ON THREE LONG-TERM THEMES

张纯厚 [美] 迈克尔·马格利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选民心理

聚焦三个长期性主题

AMERICAN ELECTORAL
PSYCHOLOGY

A FOCUS ON THREE LONG-TERM THEMES

张纯厚 [美]迈克尔·马格利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选民心理：聚焦三个长期性主题/张纯厚、迈克尔·马格利斯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4-8195-9

I. ①美… II. ①张… ②迈… III. ①美国—选民—心理 IV. ①K877.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659 号

责任编辑 喻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词

张教授将这本书奉献给对于他的姐姐张玉琴和张巧琴，他在美国中部密执安大学的导师——巴拉格林教授的纪念。

马格利斯教授将这本书奉献给对于他的父母——安尼特和拉尔夫·马格利斯的纪念。

序 言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从 1998 年到 2004 年，作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政治科学系的一名博士生时的研究成果之一的译作。我是此书的第一作者，我的导师迈克尔·马格利斯教授（Michael Margolis）是第二作者。初稿为英文，2006 年以来，本人在延安大学工作，将原稿翻译为汉语。为了让我国同行学者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了解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表达的观点，并对美国的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有所了解，我于两年前便决定出版这本书，但直到今天才得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这本书的费用来自延安大学提供给我的科研费。

这本书主要展示采用我们自己提出的制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运用社会科学统计大全（SPSS）软件对于密执安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民意测验的 1948 年到 2000 年的累积文档的相关变量数值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和相关理论阐述。我们将分析结果通过表格和文字说明在书中的相关部位予以表述，必要时，运用插图进行直观性辅助说明。研究主要运用了线性回归分析，对于为数不多的因变量只有两个数值的统计模型则运用了二元计算回归分析，在有些地方也运用了双变量相关关系分析。在最后一章，运用历史分析方

法，对于从华盛顿到克林顿的 42 位美国总统的功过，特别是其中的 18 位再选连任失败的总统的政治失败教训，进行了分析。研究借鉴了信息处理的心理学观点、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美国的人道主义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的利益冲突理论，以及政治科学中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这一研究质疑理性选择理论蔑视国家利益的观点，但并不否认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出发点。因而，这一研究的理论视角是一种经修改的理性选择理论。

我们的制度行为主义方法是一种将行为主义与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的历史制度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行为主义主要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于数字化的民意测验资料进行集合分析，研究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意见、态度和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则重视对于制度、传统、习惯、潜在的社会发展趋势等具有历史趋势和架构性因素的研究。我们的制度行为主义力图通过对于民意测验资料的分析，从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行为和背景的相互关联中发现具有规律性的社会历史趋势。

根据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书主要表述了三个观点。第一，美国选民的大多数具有相对理性，如果他们能够获取比较充分和未被歪曲的信息，就能做出合乎理性的抉择。第二，美国选民对于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的评判具有两面性。当涉及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先天或后天获得的个人特质以及个人私事时，选民的评判在政治上是非理性的，而一旦涉及政治表现和政治立场时，选民的评判则在政治上是理性的。然而，强党性却会使选民的评判发生扭曲。第三，选民在个人关系和国内群体关系上是自私的，但国家利益却可以调和国内群体利益冲突。然而，关注国家利益的大公无私精神却在国际关系上常常会表现为自私。因而，公与私都是相对的。在选举总统的全国性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不是像理性选择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关注的是个人利益；也不像心理—社会学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投票人基本上盲目地跟着党派瞎跑。实际上，

恰恰相反，选民关注的是国家利益。选民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聚焦在民族国家的三个超级目标上，即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和国家安全。第三个观点是这本书的核心理论。最终，我们认为，在历史上，民族成国家的三个超级目标，即经济繁荣、群体和谐和国家安全跨越政治制度、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发挥作用，左右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运用这三个超级目标，可以合理地解释所有美国总统的政治成功和政治失败，可以预测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也可以合理地解释其他国家和其他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成功和政治失败。成功的政府在这三个方面都是成功的，或者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失败的政府至少在这三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有的则在两个甚至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优越与否，在于能否实现并维护民族国家的三个超级目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美国研究等方面学者，以及其他对于政治、社会、社会心理、历史、美国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张纯厚

2008年12月25日于延安大学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1)
一 背景	(2)
二 方法	(7)
三 假设	(9)
四 研究要点	(11)
 第一章 美国选民的认知心理研究	(15)
一 以不确定的信息源为基础的相对理性	(16)
二 因信息而增强的选民认知和因意识形态和兴趣而 褊狭的强党性	(21)
三 总结	(27)
 第二章 美国选民的党派心理研究	(28)
一 有关总统个性的问题证伪党派性	(29)
二 党派标志重新激活投票人的党派性	(41)
三 总结	(47)

目
录

第三章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三个长期性主题	(49)
一 利益冲突中的时代性转换	(55)
二 作为超级目标的三个长期性主题	(90)
三 讨论	(113)
第四章 预测美国总统选举结果	(116)
一 以党划线的投票人热点问题感知中的 边缘运动	(118)
二 热点问题感知趋势预测模型	(141)
三 热点问题感知预测的意义	(147)
第五章 美国总统选举三个聚焦点的深层次心理分析	(148)
一 公众对于三个长期性主题的一贯关注	(151)
二 时代性热点问题和历史教训	(157)
三 相关意义	(168)
参考文献	(172)
索引	(182)

表格目录

表 1	认知党派差异的决定因素的二元运算回归	(22)
表 2	党性强度的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	(24)
表 3	党派性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个性变量的线性回归	(30)
表 4	党派性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个性变量的线性回归	(32)
表 5	党性强度和总统个性变量的双变量相关关系(1)	(34)
表 6	党性强度和总统个性变量的双变量相关关系(2)	(35)
表 7	投票人对于有关工作表现的总统候选人的 人品和特质的正面感知	(36)
表 8	投票人对于有关先天和后天品质的总统候选人的 人品和特质的正面感知	(37)
表 9	党籍与党派感情的线性回归	(42)
表 10	年龄群体冲突的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	(57)
表 11	性别群体冲突的决定因素的二元运算回归	(60)
表 12	政治地区的决定因素的二元运算回归	(65)
表 13	阶级的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	(69)
表 14	种族冲突的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	(73)
表 15	宗教的决定因素的线性回归	(77)
表 16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决定性因素的线性回归	(80)

表
格
目
录

表 17 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因素的线性	
回归 (1980 和 1984)	(97)
表 18 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因素的线性	
回归 (1988 和 1992)	(101)
表 19 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因素的线性	
回归 (1996 和 2000)	(106)
表 20 表 17, 18 和 19 中的有效变量的总结	(110)
表 21 以党划线的选民热点问题感知、党籍以及 党派投票中的边缘运动 (1980)	(122)
表 22 以党划线的选民热点问题感知、党籍以及 党派投票中的边缘运动 (1984)	(125)
表 23 以党划线的选民热点问题感知、党籍以及 党派投票中的边缘运动 (1988)	(128)
表 24 以党划线的选民热点问题感知、党籍以及 党派投票中的边缘运动 (1992)	(131)
表 25 以党划线的选民热点问题感知、党籍以及 党派投票中的边缘运动 (1996)	(135)
表 26 以党划线的选民热点问题感知、党籍以及 党派投票中的边缘运动 (2000)	(138)
表 27 依据热点问题感知趋势的总统选举预期 结果 (1980, 1984, 1988)	(144)
表 28 依据热点问题感知趋势的总统选举预期 结果 (1992, 1996, 2000)	(145)
表 29 与选民心理脆弱点相关联的总统经历.....	(163)

插图目录

图 1 总统选举增强公众对于党派差异的感知.....	(17)
图 2 公众对于总统选举的竞争性的感知.....	(19)
图 3 党派性、意识形态和对选举的兴趣.....	(26)
图 4 投票人对于有关工作表现的总统的人品和 特质的正面感知趋势 (1)	(38)
图 5 投票人对于有关工作表现的总统的人品和 特质的正面感知趋势 (2)	(39)
图 6 投票人对于有关先天和后天品质的总统的人品和 特质的正面感知趋势.....	(40)
图 7 民主党人和独立派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投票.....	(45)
图 8 共和党人和独立派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投票.....	(46)
图 9 投票人对于共和党、里根以及老布什的好感程度.....	(91)
图 10 投票人对于民主党、克林顿以及戈尔的好感测度	(92)
图 11 投票抉择的因果图.....	(142)
图 12 公众对于国家首要目标的感知.....	(152)
图 13 公众对于政府经济政策效果的感知.....	(153)
图 14 公众对于再分配和意识形态的 中立态度变化趋势.....	(154)

- 图 15 对于堕胎、政府和妇女角色持
中立态度的变化趋势 (155)
- 图 16 公众对于战争的持续关注 (156)

导言

这本书重新审视美国选民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其论点质疑并扩展关于党派性的心理方法和关于选举的理性选择方法。它部分地确认回顾性和经济性投票理论，但它对于来自从1948年到2000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的民意测验资料的分析超越了这些理论。其理论构架吸取了信息处理的心理学观点、弗洛伊德的个性心理学、心理学的人本主义观点、从群体心理学获取的利益冲突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其分析运用这一理论构架去解释美国投票人行为和心理中的似乎矛盾的现象。这本书并不展现对于选民心理学的系统性原则的全面陈述，但该研究的结果是实证地、科学地导引出来的，意在既适用于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也适用于政治科学的理论观点。因而，这一研究会强化选民心理学的科学基础。

这本书重新考虑投票决定中的心理性党派作用，探讨与党派和投票决定相关联的投票人对于有关时代性热点问题的党派政策的感知的作用，并质疑理性选择理论。努力将公众意见的长期性和时代性特征与总统选举的具体结果相联系，并将选举投票中的个人关注与国家利益和公共事业相联系。主要发现包括：(1) 美国投票人对于总统选举中党派差异的认知决定于他们所获取的与

政治动员的程度有关的信息；他们大多能够预知政治竞争的激烈性；（2）美国投票人对于总统个性的评判倾向于双重性；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估与他们所觉察到的与政治性的品格相对立的先天和后天的品格；（3）美国投票人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与他们在其他群体冲突中的行为不同。在选择总统时，他们使用三个基准领域：经济繁荣、群体和谐以及国家安全。这些构成选民心中的三个脆弱点。第三个发现是这一研究的主旋律。分析证明，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大体上可以通过投票人在经济、群体关系和国家安全方面对于总统候选人和他们的党的感知来被预知。

在结束的一章中，作者通过解读过去失败的美国总统，来体察其理论构架的力量，将其历史性地展开，并且，通过运用它来形成可检验的对于中国朝代的覆没和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的解释，来将其国际性地展开。主要的结论扩展并修改了在投票选举方面的心理党派和理性选择理论，增加新的发现和理论成分，同时，保留它们有价值的方面。

一 背景

贾尼斯·格罗斯·斯坦因（Janice Gross Stein 1993）写道，“心理分析显然是超政治的”（367）。这一思想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对于心理学研究的政治中立性的感觉。然而，从一个相反的视角，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1993）认为，“政治心理学这一术语是一个冗词：不是所有的心理都是有关政治的，谢谢上帝，但政治在整体上是心理性的”（342）。事实上，在 1920 年代，科学的严谨性在社会心理学中的确立为始于 1930 年代的政治研究中的科学的民意测验提供了方法论基础（Converse 1987, 62, 76）。从 1930 年代到 1950 年代，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背景的政治

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对于政治方面的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政治科学中的学科协作后来包括了经济学。赫伯特·A. 西蒙 (Herbert A. Simon 1993) 倡导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平衡，并且看到了经验主义和心理学版本的理性之间以及政治和经济版本的理性之间的天然结盟 (84)。这一描述反映了自 1950 年代末以来的美国政治科学中的科学背景的形成。

从政治心理学视角，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已经探讨了政治领域各个方面 的政治行为。尼尔·J. 克雷塞尔 (Neil J. Kressel 1993) 提到了两种分类。一种是七分法，即个性与政治、公众意见与投票行为、政治社会化、政治参与、大众传媒效果、国际冲突以及政治谋杀。另外一种是三分法，即社会运动与政治意识形态、学者选择与社会化过程，以及对于生存的系统性要求 (4)。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分类法，政治心理学家们努力在教科书和读物收集中展示一个描述他们学科的对于分科的平衡表现。

然而，在我们看来，唯一已经被深入探讨的政治心理学领域是投票行为心理。在这一领域，已经被清楚地规范并有影响的分科是社会—心理、回顾—经济，以及理性选择。相对新近的意识形态问题，束缚论点尚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

伯纳德·R. 贝雷尔森 (Bernard R. Berelson)、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 (Paul F. Lazarsfeld) 和威廉·N. 麦克非 (William N. McPhee 1954) 认为投票人因他们基于社会经济和阶级地位、党派、宗教、意识形态、家庭遗传、性别、年龄以及地区的群体身份而分化。一个具有交叉群体身份的人受到交叉压力，不太两极化。群体符号、群体隶属和群体心理在政治动员中比热点问题更重要。选举竞选活动有助于使人们两极分化，使极端左派、极端右派和完全退出的“极端中间派”增加，而使温和派减少 (Berelson et al. 1954, 21—22)。沿着这一社会—心理路线，安格斯·凯姆伯尔 (Angus Campbell)、菲利普·E. 匡威 (Philip E. Con-

verse)、沃伦·E. 米勒 (Warren E. Miller) 和唐纳德·E. 斯托克斯 (Donald E. Stokes 1960) 进一步界定在热点问题上的党派符号和党派立场裂隙，并将党派性与家庭遗传相联系。依据这种看法，心理性党籍是最重要的投票决定因素，大部分投票人的意识形态是微弱的。

V. O. 凯伊 (Key 1966) 偏离了心理投票决定因素。首创于他的著作，《负责任的选民：总统选举中的理性》里的，他的著名宣示是“投票人不是傻瓜”。选举人没有被由极端娴熟的鼓动分子所激发的潜意识，而是被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和表现以及行政官员的感知和评价所触动。转换者们经常跨越党派界线，但固守者们也不是永远稳定的。

莫里斯·P. 费奥瑞娜 (Morris P. Fiorina 1981) 进一步阐明了凯伊的负责任投票人的理论，提出了经济与回顾投票理论，并将它与理性选择相联系。他争论说，“为了确定现任者表现得坏还是好，公民只需要计算他们自己的福利的变化”(5)。“与其说是前瞻性的决定，不如说投票决定是回顾性的决定”(6)。过去决定现在和将来，回顾性评估动摇党派的稳定性。

费奥瑞娜以安东尼·道恩斯 (Anthony Downs) 的众所周知的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为基础。道恩斯 (1957) 将他的对于理性的经济界定运用到民主选举中的政党、利益集团以及投票人个人的行为上。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达到他的目标的过程中，将费用最小化，将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政客来说，政策制定是达到获取职位的最终目的的手段。投票人对政策本身并不感兴趣，但却对他们自己实惠的收入感兴趣。投票人个人会依据他（或她）从党派差异中所感知到的实惠来决定投票选现任者，还是选挑战者，还是弃权。这种对实惠的计算会因具体候选人以一个党的名义赢得职位的可能性而打折扣。

灵恩·麦克林 (Lain McLean 1991) 将理性选择方法与博弈论